论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生态审美意蕴

胡建东, 穆艳杰

摘 要: 在马克思的思想论域下, 劳动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生存方式和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力, 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核心论题。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构建过程中, 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劳动”是极其重要的研究维度。马克思劳动理论中关于“劳动创造美”和“美的规律”的相关论述, 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审美意蕴。这一理论从人与自然关系连接的中介——人的劳动实践出发, 倡导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统一。其具体表现为“美的规律”“自由劳动”及“人的本质”的经典“三位一体”架构: 劳动是建构人与自然生态审美关系的现实中介; 自由劳动是生成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之美”的必要条件; “美的规律”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生态审美意蕴的内在尺度。科学阐释马克思劳动理论中的生态审美意蕴, 不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劳动理论的生态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而且对于推动实践主体向生态人性的复归、培育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真善美”道德意识和生态价值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劳动; 自然之美; 美的规律; 生态人性

中图分类号: A81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1)06-0018-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6.003

当代西方主流生态理论已经基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所蕴含的生态思想, 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无法支撑生态文明这一全新文明形态。在他们看来, 受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统摄的实践主体本质上无法达至自由自觉的活动, 而只能以一种征服、改造、利用的姿态来宰制自然。其中, 一个典型的批判就是对马克思审美本质论的批判。这一观点认为: 劳动所表征的人的本质对象化片面地强调主体性, 而从根本上忽视了主体间性。与此同时, 主体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受人性和资本等内外因素影响并非真正善美; 一味强调主体的实践劳动所延续的仍旧是 18 世纪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时代信条。除此之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资本主义批判也不再享有经典的根据地位; 各种绿色思潮纷纷脱离现实, 而走向以生态主义为基础的绿色乌托邦的抽象假设。但是, 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 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恰恰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 回应这些质疑与批判为我们深入阐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注入了深层的思想动力。而要想对这些质疑与批判进行回应, 就必须从多学科交叉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 但这样就远远超出了一篇论文的叙说范围。所以限于篇幅, 本文并不打算介入具体性的论争, 而是就相关质疑与批判为“引子”抛出问题, 从正面诠释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生态审美意蕴, 以“自由劳动”“人的本质”及“美的规律”的经典“三位一体”架构为基础, 从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与中国实践研究”(16ZZD032);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MKSLLO2)

作者简介: 胡建东,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622275753hjd@sina.com (吉林 长春 130012); 穆艳杰, 吉林大学匡亚明英才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态美学的视角回应质疑与批判, 进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性, 为现代社会的人类主体向生态人性复归提供思想基础。

一、劳动是建构人与自然生态审美关系的现实中介

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 关于审美意识的起源、审美的本质、审美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等问题, 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 美学家们始终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事实上,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 就已经开启了美的研究历程。在柏拉图看来, “美本身, 加到任何一事物上面, 就使那事物成其为美, 不管它是一块石头, 一块木头, 一个人, 一个动作, 还是一门学问”^{[1](P188)}。在这里, 美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理念范畴, 其仅仅只是由主体意识而衍生出的观念对象, 并非实践对象。所以, 美只是脱离了现实具体实践的人的意识活动的抽象产物。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了美是一个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范畴, 但却从“秩序、匀称与明确”等形式方面来规定这一范畴, 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与前者极为相似的“静观”态度。所以, 亚氏之理论在本质上没有跳出柏拉图的思维高度, 对于“美”的理解采取的依然是由内而外、以思维规定存在的解释方式。包括后来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 都只是停留在精神意识层面来理解美的范畴。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后, 费尔巴哈从美的客观性出发, 以直观的方式来解释客观世界, 但是却无法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和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直至马克思那里, 其通过解构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理性神话和主客二分思维传统, 将哲学研究的立足点由思维意识和物质存在的“两极”引入到了现实实践, 为科学的“劳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逻辑基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中, 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美”的论断, 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的进一步深化, 最终科学地阐释了审美意识产生根源, 厘清了美的起源与主体实践活动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强调,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P196)}。主体的实践活动虽然受客观外在世界的制约, 但同时在改造外在世界的过程中生成了主客体和主体间的双重关系, 进而产生了世界历史。所以, 一切的意识起源都应该到人的实践活动中来寻找。马克思对于劳动本质的理解主要是从本体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交往关系来切入的, 劳动实现了“自然的人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美感意识和艺术起源的实践前提。并且也就是在这种交互过程中, 实践主体与外界发生关系形成了最初的美感体验。

马克思关于美感产生于劳动的论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意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 主体意识与客观自然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在人类意识初步自觉之时(古希腊时期), 人与自然遵循着同一种运动规律。在这种运动规律的规定下, 人与自然呈现出一种高度统一的生命有机整体。主体在体验周遭世界的生命过程中, 最初的意向关系并不是近代以来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征服与被征服的线性关系, 而是以“宇宙生成论”为基础的和谐共存关系。比如,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 其目的就是通过探寻自然运动之规律, 使主体在与客观自然互动中达至有机和谐的生命体验。所以, 正如柏拉图所言, “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的本性的一部分”^{[3](P602)}。最初的人类心灵本身就包含着自然的内在固有灵魂, 而非是近代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脱离道德前提预设对自然的任意宰制。所以从原始的人类本性来看, 其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蕴含着高度明显的生态性价值特征。因此, 生态性是人的本性之一。只是在理性和资本的抽象统治下, 人类将这一“原始”本性已经遗忘殆尽。所以, 现在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从生态价值观念的养成培育入手, 推动实践主体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发现自然之美, 进而达至向“最原始”的生态人性复归。但是, 人性的生态化不可

① 以下简称为《手稿》。

能在“静观”中获得，而只能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来获得，只能在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所以，马克思高度强调劳动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了“劳动创造美”的著名论断。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劳动主要指涉的是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P161)}。马克思将人的身体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只是在自然界这个前提下才得以进行。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交往关系建立的桥梁和纽带，是构成主体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审美关系的逻辑前提。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在这种“依附”关系中使得主体的生态审美意识和“血缘”意识的产生成为可能。但是，这种“依附”关系不是单向的。主体在外化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中合乎规律地改造自然，使自然朝向符合人类生存本性的方向演化，并用生命切实地感受着自然带来的馈赠，从而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之间的生命进程互动。在这种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关系得以建立，作为主体生存基础的自然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只不过，这种逻辑在这里体现为一种“倒置逻辑”：人对自然审美意识的产生，表面上看是出自人的理性活动；但在更深的层次上事实上来源于人的感性层面的直观感受。所以现代生态哲学的最新流派之一——生态现象学就认为，人在“遭遇自然”的过程中，其原始的第一反应并非理性思考，而是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情感映射和伦理关怀，这一流派将其称之为“伦理学反应的第一时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劳动是构成人与自然之间审美关系的逻辑前提和现实中介。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劳动也并非总以“本真”的劳动形式展现。与异化劳动相对立，如果说劳动是构成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逻辑前提，那么自由劳动则是生成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之美”的必要条件。

二、自由劳动是生成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之美”的必要条件

自由劳动从根本上区别于受制于现存种种客观逻辑所主导的异化劳动。当劳动是出于人的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开展对象化活动时，其内在的生命逻辑就必然会成为创造美、发现美和体验美的生态美学。马克思对劳动本质和美的本质的深入阐释，既完成了从形而上学层面对劳动范畴和美的范畴之关系构建，又在现实实践层面使自由劳动成为美之本身和创造美的对象性活动。自由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逻辑展开，是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关系和生成自然之美的最为根本的生命逻辑。首先，劳动在外化为主体自身本质力量时，必然要通过借助客观对象——自然界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先在的对象之美得以具体开显；与此同时，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由主体实践的限制性原则经过劳动逐步呈现出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特征之“美的原则”。所以，主体所能够直观到的对象之美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得以进入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其次，主体通过具体的对象性活动，以理性和感性并进的方式实现了与客观自然的照面，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建构。这种互动关系既可以是主体生命存续需要为基础的物质关系，同时也可以是以主体内在在精神生活需要为基础的审美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以来由理性所主导的单一宰制范式，而演变为以实践为基础与自然亲切照面、亲密互动的生命活动。它在本质上展现出的是深刻的经验性与超验性、体验性与直观性的统一。最后，劳动作为主体与客体互相成就的生命活动，既是对主客体关系抽象性的辩证否定，也是对主客体关系现实性的实践肯定。其所展现的是主体经由对象性活动达至对生命本质追寻的美妙历程。劳动作为具有肯定性和否定性辩证统一的现实性活动，只有在主体的“先验意识”和客体的“外在直观”高度统一、相互结合的状态下才得以进行。所以，劳动通过具体的感性方式达至了对主客观世界的反思批判，“贯彻的是具体劳动的特定主体的特殊性对普遍性的寻

求”^[4]。也就是说,劳动以一种具有否定向度的历史逻辑,超越了对客观世界的本质主义理解和物质主义还原,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对客观世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性与工具性的整合。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现实性的哲学阐释,不仅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高度突出了劳动对于现存世界的基础意义,同时也从美学的高度刻画了主体生存发展的自由超越本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5](P207)}。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内容,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现实基础。人类脱离了劳动实践,就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基础。“自身的自然”所表征的是人的生存逻辑,是主体改造自然的原始动机。“外在的自然”则是主体改造动机发生的具体对象。“自身的自然”与“外在的自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了主体生命与客观自然和谐统一,由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之人”走向了受道德法则和价值规律制约的“社会之人”。一旦主体本质力量在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价值规律的前提下得以自由发挥,那么主体自身就意味着彻底解放,自然在这种交互进程中也一并解放。只有实现主体自身和外在自然的双重解放,人类才能获得由物质性功利追求走向审美性价值追求的现实前提。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人的手才能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克尼尼的音乐”^{[6](P552)}。恩格斯通过阐述劳动对人的生理发展的影响,论证了劳动在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质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形式来看,自然更多的是作为异己的存在与人相对。也即是说,自然并不是像自然主义和生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天然就是人的审美和情感依赖对象;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的不断交往中才具备生成人与自然之间生态联系的现实条件。“正如马克思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一致一样,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环境的改变和人类的自我改变也是一致的,这正是他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的本来含义。”^[7]并且,劳动还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完善了人类的语言功能和审美功能,使生命主体在依赖自然的同时能够超脱于自然,在直观、体验、反思等过程中感受自然的神奇与魅力,进而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一并到达自由自觉的生存发展状态。

劳动作为主体不断雕塑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的生命活动,既是人的本质力量释放,也是对客观世界合理占有,展现的是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高度合一的生命现象学。“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仅意味着劳动是维持身体存续的生命自然现象,而且意味着劳动是创造生活和改造社会的“类”现象。第一,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这就决定了劳动既是对客观存在之美的直观,同时也是对主观认识之美的还原。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并不单纯地是对客观必然性的绝对把握;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作为“双重尺度”的劳动实践和生命体验高度统一。第二,劳动内含的双重尺度,使得美的创造活动和美的欣赏活动在“现实的人”的历史交往中得以统一。因为,美的创造活动一方面要遵循既定的外在尺度和客观规律,同时还受内在的主观意识支配。主体既要作用于外在世界,同时还必须对“人化”后的外在世界进行接纳和欣赏。所以,劳动内含的双重尺度表明主体具备在创造和体验的互动过程中达至自由自觉生命状态的可能性。并且,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状态还意味着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向健全劳动主体复归。第三,劳动不仅以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对美的直观体验,而且还以生命互动的方式实现了对审美过程的主观还原。劳动以否定之方式实现了对客观世界之肯定,既体现出实践主体对自然规律之服从,又以主观意识和价值规范的方式实现了对外在尺度之超越,展现出主体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总而言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本质的相关阐述,推动美学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即由过去的美的本质追寻转向对美的产生和美的体验的现实把握。

三、“美的规律”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生态审美意蕴的内在尺度

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相关论述不仅是当代艺术学和美学研究的重要概念范畴，而且也是生态文明研究的重要概念范畴。其对于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生态性，发掘其内涵的生态审美价值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与动物不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P163)}。马克思通过提出“两种尺度”（一个是人的内在尺度，体现人的主观目的性；另一个是物的尺度，体现的是人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性），分别从纵向和横向阐释了作为审美主体的内在本质和类的特征。“两种尺度”既包括属人社会的，也包括先在自然的。所以，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相关论述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突出人作为一个区别于动物的存在主体，是理性与非理性、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物质尺度和精神尺度的完整统一体。而要达至上述三大关系的统一，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同时满足其精神欲望，就必须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来完成。只有发挥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征，人的审美意识产生方能具备最理想的现实基础。届时，人类才能对自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美的意识”，对客观存在之“美的规律”进行科学把握，并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处处地运用这种规律。这样，自然对于人类才能由过去所谓的惧怕存在和对立关系，走向主体所能感受到的审美存在和共生关系。

从纯粹的哲学层面或者说伦理学层面来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之“自由自觉的活动”概括是最符合人类本性，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论断。自由，不仅仅在于发掘出客观的自然规律并且正确运用，做到依附于自然的同时超拔于自然；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精神层面的升华和自由意志的培育，在道德层面做到自由选择，到达“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生命境界。自觉，指的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生命主体从根本上区别于单一的受制于自然的动物，是能够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反思自身、关照自身的现实存在物，是规律性与目的性高度统一的生命主体。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内含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觉和人性自觉的典型体现。对于这一点，马尔库塞也曾指出，“马克思的思想，是把自然界看成这样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成为满足人的天生媒介物，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本身的悦人力量和性质也得以恢复和解放出来……其方向是旨在顺应自然中的生命的维系、感性、审美性质。因此，改造了的‘人化的自然’，将反过来推动人对完满的追求”^{[8](P128)}。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美的规律”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存在于主观意识的思维规律。主体审美意识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物质关系单方面交往的结果，而是在“自然的人化”、感官的进化，以及思维方式变革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总的来说，“美的规律”是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演化而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机共存的规律。它既具有社会的属性特征，也具有自然的属性特征。但是应该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先于人与人的关系而存在且构成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的现实基础”^[9]。所以，在马克思的思想论域下，主客体关系是“第一性”的，而主体间关系则是“决定性”的，两种关系高度统一于人类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相关论述所展现出的生态审美意识，既区别于黑格尔脱离主体的现实实践以抽象的精神运用来解释主客关系的范式，同时也区别于费尔巴哈脱离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单一的感性方式来解释主客关系的范式。也即是说，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也即为通过劳动实践，在受制于自然的同时超越自然，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对象的人。此外，与“美的规律”相对应，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提出了“完成了的自然主义”范畴；其目的就是突出强调主体在发挥能动意识的前提下，在现实性实践活动中达至人与自然的价值平等这一理想境界。

四、马克思劳动理论生态审美意蕴之生态人性培育功能

从当前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来看, 推动现代社会人类意识的生态化发展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进行生态人性的养成培育, 既具有高度科学的理论支撑, 同时也是当前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

从理论层面来看, 前文我们已经重点揭示了经验范畴和感性活动对于人的审美意识形成的基础性和重要意义。但是, 对于经验和感性的忽视恰恰是现代人类生存逻辑的一个本质特征。哲学家大卫·阿伯拉姆斯曾指出, “在意识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 关键的一步在于希腊人对字母书写的引入”^[10]。在他看来, 字母书写使得人类关注点逐渐从最初的自然游离出来, 转而关注更加抽象的事物, 如字母、数字、概念等。所以, 现象学就试图通过描述的方法, 将人类的目光重新聚焦到经验上来, 以解蔽工具理性对主客体原初经验和本质要素的遮蔽, 使人类能够重返生活世界, 在感受周遭世界的生命过程中体验现实世界的意义之美。对于具有能动意识的人类主体来说, “体验”意味着主体获取感性经验的道路和方法。至于如何“体验”, 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家基本上都是在“意识结构”领域中来开辟道路, 胡塞尔后期、包括他的弟子海德格尔虽然看到了“生活世界”对于经验获取的重要性, 但是在具体的获取路径上受唯心主义的制约却寸步难行。就核心内涵而言, 现象学所强调的“生活世界”与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世界”具有价值指向的高度一致性。具体来说, “生活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范畴至少指涉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层是文化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现实世界); 第二层则是剔除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念的以纯粹感性经验为表征的生活世界(现实世界)。从人类初民开始, 感性直观就是沟通人与自然的纽带, 因为早期人类的原始思维就是直观的、感性的; 所以感性知觉最有可能为人与自然的友好交往提供原初经验。在感性知觉的世界之中, 人类在与周围自然相遇之后获得了一种现实的生态规范。这种生态规范的获得又会被重新应用于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中, 人与自然的丰富的交往类型在被世俗隐匿之后得以再度回归。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合理的交往类型的建立会逐渐地唤起人类的原始记忆, 使人类再次获得那些曾经拥有而后又被遗忘的生态智慧。从上述视角来看, 马克思在 19 世纪就以现象学的方法开显了最为本原的主客体关系, 为我们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合理处理二者矛盾, 进而重返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理论指引。但是, 马克思通过劳动范畴建立的人与自然所有方面的联系, 恰恰被现代哲学、尤其是生态哲学不自觉地忽视了。因而, 现代生态哲学才始终无法走出生态主义的理论窠臼, 最终将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诉诸彼岸世界的生态乌托邦主义。马克思劳动理论并没有试图使用现代环境伦理学所崇尚的逻辑分析方式来论证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与义务, 而是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劳动来获取关于客观世界的感性经验, 以此建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总而言之, 马克思以劳动的方式为人与自然提供的开放视域, 不仅从哲学高度超越了传统哲学所引以为豪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而且为我们摆脱狭隘的理性主义束缚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 也“为哲学思考、表达和对我们的自然经验作出全方位的反应提供可能”^{[11](Psi)}。这种理论可能性在深层次预示着人性生态化复归的现实可能性, 为抽象的理论假设转化为可供我们期待的实践活动打通了现实通路, 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式的抽象审美到以劳动为基础的现实审美的范式转换。

从实践意义来看, 近代以来, 西方现代化进程最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就是以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 以计算、规定、还原等方式作为建构生活世界的基本法则, 使人类的价值观念、生存目的和生命意义彻底钳制于高度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之中。于是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理性开始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 主体对自然的宰制在工具理性的鼓吹下获得了正当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作为主体的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基础的人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危机。那么, 如何推动现代社会人类摆脱当前的价值危机泥淖, 重新复归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则是现代生态理论所面临的核心论题。有学者指出,

必须通过重估自然价值的方式，“重新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念，将现有的人性从工具理性中进行解蔽，从而为人性的生态化复归提供价值预设前提”^[12]。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既不能停留在工业文明的思维模式下进行现实建构，也不能超越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进行抽象假设。唯一的路径就是按照马克思的提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在感受、认知、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现自然的本真价值。单就“审美”范畴本身而言，在西方哲学的论域下事实上是一个剥离现实的抽象存在，内涵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维度。然而，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这里，“审美”范畴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推动下走向为一种现实存在，即通过劳动这一中介与人的生命活动实现了有机结合。所以，审美的获得、生态人性的培育必然要在现实的劳动中进行。应该明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背后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换言之，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分配关系”^[1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14](P46)}，依靠社会和政府同向发力，以优美的劳动环境、充分的就业条件、和谐的劳动关系、公平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等手段建构科学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进而满足人们对自由劳动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一方面，应积极借助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生态学内涵的整体性原则对人的价值认知进行合理规范，为人性重新向生态向度复归提供科学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社会的思想引领功能，为新时代生态人性培育夯实价值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强调人性的生态化，是缘于作为拥有能动意识的实践主体——人的本性回答的是主体对于现存世界终极价值关怀的理解，规约我们到底以何种价值观念和生存姿态指导自身的生活。因此，对于生态人性的确证在深层次上关乎的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虽然需要借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相关政策制度保障；但是，其最为关键之处还在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否达到了与生态文明理念相适应的现实要求。这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最根本、也是最紧迫的现实命题。所以，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高度强调要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基本准则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以从根本上满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实践主体的内在价值诉求。

五、余 论

无论人类主体置身于何种文明形态，对文明形态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表征人的本质力量的主体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的现实劳动中，主体自身采取何种姿态面对自然是决定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与否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劳动实践具备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性地位。在多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碰撞融合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理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领会其关于劳动之审美功能和生态意识的相关论述，对于人类主体走向全面发展和自由自觉，以自由之形式领会生命存在意义、追寻终极价值关怀、参与文明形态变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实质根源仍然是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自身的增殖扩张逻辑。因而，以马克思劳动理论内涵的生态意蕴唤醒主体的生态觉悟、培育主体生态意识，引领推动主体行为活动的生态化只能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应该明确，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路径还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对私有制的否定性超越，最终建立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价值指向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制度变革既是生态社会得以建立的前提，而且也是推动主体生存发展方式变革的现实条件；在制度变革之外谈论生态文明建设，任何形式的努力都会在私有制和资本全球权力的裹挟下而付诸东流。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等现实路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生

产方式实现根本转变, 做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苗田. 古希腊哲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4] 高星, 赵雪. 劳动美学与主体生成——马克思劳动美学的生命现象学[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拥军. 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当代意义[J]. 理论探讨, 2020(4).
- [8]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季小兵,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9] 郎廷建. 生态正义概念考辨[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 [10] [德]U. 梅勒. 生态现象学[J]. 柯小刚, 译. 世界哲学, 2004(4).
- [11] Brown, C. S., T. Toadvine. *Eco-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A]. *SUNY Series in Philosophy and Ethics. Eco-Phenomenology: Back to the Earth Itself*[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 [12] 张敏. 论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与人格的生态涵育[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5).
- [13] 阎喜凤. 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环境伦理思想的逻辑研究[J]. 理论探讨, 2020(1).
- [14] 习近平.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On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Marx's Labor Theory

HU Jian-dong, MU Yan-jie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Marx's thought, labor, as the most essential wa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of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s the core topic concern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labor", the intermediary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esearch dimension. The related exposition of "labor creates beauty" and "the law of beauty" in Marx's labor theory contains rich and profound ecological aesthetic meaning. Starting from human labor practice, this theory advocates the unity of "natural beauty" and "human nature beaut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is embodied in the classic "Trinity" structure of "the law of beauty", "free labor" and "human essence": labor is the realistic intermediary that constructs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al ecology; Free labor is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natural beau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law of beauty" is the internal scale of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Marx's labor theory.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implication in Marx's labor theory is not only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is of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and defend the 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bor theory; Moreover,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the practice subject to ecological humanity and cultivate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ecological values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consistent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abor;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law of beauty; ecological human nature

(责任编辑 孙 洁)